

成败

从历史看管理

晋商

周建波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成敗

卷之四

首商

商

成败

晋商

从历史看管理

周建波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晋商是明清之际，六百年间，最负盛名的全国性商帮。它的崛起、兴盛以及衰落，它的东掌合作制度、顶身股制度、员工遴选制度，它从商的坚毅、魄力、计谋，等等，蔚为大观。

本书从明初开中制——晋商之起家说起，至辛亥革命——晋商日暮途穷为止，纵横数千百年，激扬数十万字，从时势、制度、人事诸方面，剖析了晋商之兴衰成败。以古喻今，发人深思。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败晋商/周建波著.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111-20796-2

I. 成… II. 周… III. 商业经营—经验—山西省 IV. F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08986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程天祥 版式设计: 刘永青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7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

170mm×242mm · 23.75印张

定价: 48.00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推荐序一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山西人民创造出来的一项伟大奇迹。近年来，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行，“晋商”热也逐步升温，出现了一批反映晋商的影视作品，如《三晋源票号》、《龙票》、《白银谷》等。其中，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力作《乔家大院》更是将“晋商”热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部戏作还被引入韩国，在韩国电视台播出后亦引起轰动。

我和周建波教授是在韩国认识的。周建波教授作为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韩国外国语大学的交换教授，于2006年2月底至2007年2月底在韩国外大国际地域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中国学科从事教学工作，和他一起来的中国教授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商金林教授、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张德兴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沈卫威教授、延边大学中文系的黄贞姬教授以及深圳大学的段书伟教授、杨晓霞教授。我以韩国外大副总长，当然也是中国学研究教授的身份，宴请他们。席间，谈起各自的研究工作，周教授说他是带着一个有关晋商的研究课题来的，有望在韩国外大工作的这一年中完成它，并希望著作完成后由我来写个序。韩国外大一贯支持、鼓励外籍教授的研究工作，因而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并说，这既是北京大学

的科研成果，也是我们韩国外大的研究成果，因为你是韩国外大的外籍教授呀。现在，周教授的著作写成了，我很高兴为他写这个序言，只是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的政治、外交，对于中国的经济、经济史尽管有所涉猎，但毕竟研究不多，因此在写序言前，专门和周教授聊过目前晋商的研究状况，并通过周教授的引荐浏览了一些关于晋商的书，对晋商取得的“足迹遍天下”、辉煌五百年的业绩自然是非常之敬慕。

和其他关于晋商的著作相比，周教授的这本关于晋商兴衰的著作最大的特点是思维宏阔，表现在既从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本国区域经济变迁的宏观高度看问题，也从晋商的微观经营模式——信用之道角度看问题，既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角度看问题，也从政府的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这个立论角度是正确的。古人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周教授的著作由于考虑到了空间的宏观性——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时间的长远性——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政府政策的推动及企业自身经营方式的变化，因而得出的结论及给人的启发都是很深刻的。

正如周教授所指出的，14、15世纪以后，亚欧大陆各地均出现了随着农业生产进步、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突破地区、国家的限制，而走向更大范围的国际交换的趋势。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商业势力来到东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下子对接了起来：中国的茶、丝绸、瓷器、糖等源源不断地到达海外，海外的白银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中叶后才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才出现了将农村过剩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改革，才出现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

在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推动明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内地商人得到了大发展的机会，而以江浙商人为代表的沿海商人却受到政府海禁政策的限制而饱受压抑，这是与南宋末年形成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分不开的。

然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会在一段时期埋葬晋商的事业，并促进沿海

VII

商人的崛起。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意味着一个以沿海港口联系世界各地的新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的改变。沿海的江浙商人由于靠近新经济革命的中心而迅速崛起，内地商人由于远离新经济革命的中心而逐渐衰落。

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在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变迁的同时，也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应从官商结合促进经济发展（西方称之为重商主义）向政府退出经济的主战场，放手让民间商人发展的方向转变，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的变化，意味着企业的经营方略也必须变化，即从过去的盯着政府转为现在的盯着市场。当时代要求企业转变经营方略时，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新时代的要求合拍，谁就是成功者，否则将因失去市场的先机而被淘汰。进入近代后，晋商所以失败，一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以海上贸易联系世界各地，这使晋商的边疆市场大大萎缩，此乃对晋商宏观市场方面的严重挑战；二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的转变，要求企业从盯着政府转向盯着市场，这是对晋商微观经营模式的严峻挑战——晋商就是在宏观市场环境和微观经营模式都遭遇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走向衰败的。反观以江浙为代表的沿海商人，一方面赶上了商品经济全球化要求以海上贸易建立世界市场体系的新时代，其地利优势大大发挥；另一方面又赶上了在经营模式方面由盯着政府向盯着市场的转变，其草根商人（明清时期的江浙商人由于很难和国家战略目标结合，只能在为民服务上多做文章）的优势得到发挥——江浙商人由于在这两个方面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成为时代的新的弄潮儿。

上述就是周建波教授《成败晋商》一书的主要观点。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第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是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不能阻止的发展趋势，作为商业组织的晋商只能顺应而不能逆转，至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只是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这是一种给中国、给韩国，也给其他的东方国家带来了很大灾难的表现形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讲，“落后就要挨打”，即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这种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反思。2008年

VIII

北京奥运会的口号——“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明星企业海尔的口号——“国门之内无名牌”，都反映了中国人的这种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努力。

第二，传统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的改变，是商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作为政府和商业组织只能顺应而不能逆转。举个例子来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和经济的中心都在黄河流域，因此在唐中期之前，韩国和中国的商业来往主要围绕着以登州为中心的山东半岛进行，包括有名的徐福东渡也是围绕着山东半岛一带进行的。但是唐中期之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韩国和中国的商业来往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到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等，这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商业往来路线的影响。所谓“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讲的就是这一“地利”变化的作用，作为商人，只有主动地适应这种“地利”的变化，才能做到“长袖善舞”。

第三，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由官商结合到放手让民间商人经营的转变，以及企业经营模式由盯着政府向盯着市场的转变，都是商品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作为商业组织也只能适应而不能逆转。众所周知，当代韩国的大企业是在历届韩国政府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当时这样做无疑是有道理的。在民间经济力量不发达的情况下，要发展经济，只有发挥政府的规模经济的力量。但是，这样做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除了造成官商勾结的腐败、败坏社会风气外，另外一个很不好的作用，就是资金市场的价格信号不透明。由于受到政府重点支持的企业从银行贷款容易，结果纷纷走上了不计成本、拼命扩张的道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谓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东亚社会转变的一个信号，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和鸦片战争爆发对于满清社会的意义是一样的：都要求政府从管制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都要求企业从盯着政府走向盯着市场。不同的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还是“莽林”的世界，崇尚武力决定一切；而东南亚经济危机时，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已经建立起来，因此韩国在艰难转变的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包括中国政府提出的人民币不贬值，都对韩国成功地克服危机起了

IX

很积极的作用，而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表现！

在韩国企业界转轨的过程中，有的能够主动转变、大胆转变，结果成功地克服了危机，走向了更加绚丽的成功之路，如三星；也有的仍继续原来的经营轨道，主动改变自身不够，结果被市场所淘汰，如大字。我想，当初的晋商也是由于变革自身不够，或者不知道往哪里变革，或者虽明白往哪里变但变革动力不足，最终被市场淘汰的。

无疑，正是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所引起的国内区域经济的变迁、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模式的变化，才最终造成了晋商的衰败。不过，正如周教授所说的，天下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成功和失败都是阶段性的。当前的西部大开发给新晋商的复兴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只是，新晋商只有继承了老晋商的艰苦努力、讲求“义信利”的传统，抛弃其不合时宜的某些传统，一如经济危机后的韩国企业一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迎来第二次更加壮丽的辉煌。

我祝愿晋商的后裔能够成功地迎接西部大开发的挑战，重铸昔日的辉煌；我也希望更多的韩国企业能够顺应国际化的新发展，加入到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行列中去，为晋商的再崛起，亦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多做贡献。

池在运 教授

韩国外国语大学副总长，中国语学科教授

2006年12月26日于首尔



推荐序二

世界是平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把中国卷到了世界经济活动的中心。中华民族正在把165年开始的屈辱历史抛在脑后，大步地向前走。人们在探讨大国的崛起的同时也在议论着如何使得中国走上长盛不衰的兴国之路。其实任何一个兴起的大国的背后都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企业和商业的力量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兴盛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中国过去近30年的崛起没有企业和商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中就有着各种商业和商人的兴衰，而引致一个地域的经济和文化的兴盛和衰落。晋商在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晋商发展的历史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人们已经开始记录21世纪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晋商500年崛起、兴盛和衰败的历史，对于我们探讨兴国之路，大有裨益。

周建波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有很深的研究功底。周建波教授同时在光华管理学院授课，非常受学生欢迎。而现在大家看到的《成败晋商》一书就是周建波教授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

周建波教授的《成败晋商》一书不是简单地把有关晋商的史料加以整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于历史事件的精心梳理，得出一些非常有用的、对现实社会有指导意义的经

验和教训。例如，当前中国社会中，农民贷款难、城市工商个体户贷款难、大学生助学贷款难、中小企业贷款难等问题喊了很多年了，就是解决不了，成为社会的痼疾，而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资金支持这个问题早在数百年前的明清时期，就被晋商成功地解决了，这对当前的金融民间化很有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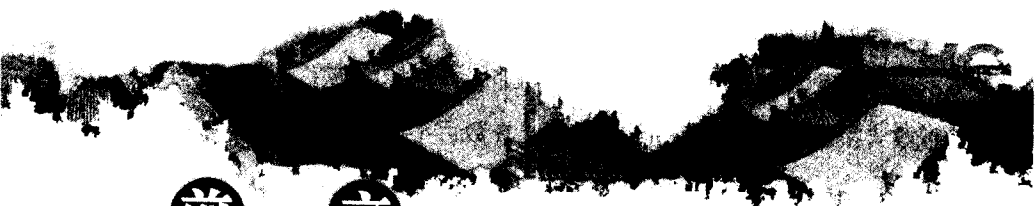
周建波教授还特别分析了当时晋商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这对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如何在实际工作中结合实际，采纳有关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帮助很大。周教授指出，明清时期晋商的崛起、兴盛得益于三大要素，一是商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二是官商结合的垄断，三是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作用。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明清政府看到了蕴藏在商人中的巨大力量，开始改变以往的亲自经营（国营）的政策，向国家拥有重要山川资源的所有权，但向民间开放经营权（国有民营）的方向转变，这种官商结合发展经济的体制，在西方被称为重商主义。而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形成使明清政府将重点放在北部边疆，这使得长期活动于北部边疆，习惯于跟边军、游牧民族打交道的晋商，自然而然地被选择为执行政府战略目标的最佳合作伙伴，晋商的发迹由此而来。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经济是天然的革命派，总是以不断地破坏旧制度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商品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一方面要求以沿海来联系内地，进而联系整个世界，这使得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又要求打破官商结合的垄断，走向自由竞争，这样就使得商运的天平开始向不利于晋商的方向倾斜，并最终驱使它走向衰败。当然，商品经济全球化的再进一步发展，又要求以沿海经济带内地经济的发展，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国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这又给新晋商的再次崛起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总之，周建波教授《成败晋商》一书的面世为研究晋商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内容，填补了一个空白，同时也为愿意通过学习历史提升自身的管理者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武常岐 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2006年12月27日于博雅



前

言

这是一本研讨晋商崛起、兴盛乃至衰败的小书。

笔者认为，要了解晋商的崛起、兴盛乃至衰败，都必须弄清明清时期中国和世界的特点。

明清时期，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区都出现了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趋势，并从地区交换、国内交换发展到国际交换，这大大扩大了产品的交换范围，促进了专业化手工业市镇及农工商一体化的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形成和发展，为晋商、徽商等十大商帮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无疑，这是有利于晋商崛起、兴盛的第一个利好信息。

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民族国家的力量，使它们有实力从事过去想做却没有能力做的事情。这一时期的明清政府专注于北部边疆之经营，到清康熙乾隆时期终于彻底解决了为患中国两千多年的北方游牧民族问题，并将新疆、西藏、蒙古、东北等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欧洲鉴于通往东方的海上商路为阿拉伯商人所控制，陆上商路又为新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所阻挡，开始探索通向东方的新商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滨海国家通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海上探险，于16世纪初在南中国海与明王朝相遇。俄罗斯作为欧陆国家，则积极向西伯利亚扩张，于16世纪下半叶起在地域上逐渐接近中国，其使者佩特林还于1618年到

XIII

达北京。在19世纪初叶以前中西文明最初阶段的交锋中，中国以发达的经济、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强大的军力等，阻挡住了西方海上和陆上的进一步东进。这种长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对发展商品经济甚为有利，而政府对北部边疆的大力经营，亦为晋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无疑，这是有利于晋商崛起、兴盛的第二个利好消息。

这一时期，在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上，无论东西方都采取了政府拥有重要山川资源的所有权，而向民间开放经营权的体制，在西方这被称为“重商主义”。它是一种官商结合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是民间商人力量弱小，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法规法令、意识形态没有建立起来，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形成，乡土主义、地方排外势力还比较强大的产物。其最大的优点是借助王权规模经济的力量打击各地区的割据势力，为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全球化开辟道路。其最大的弱点是官商勾结，搞不平等交易。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民间商人力量的增强，他们越来越不能容忍专制王权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因而这种官商结合的垄断是一定要被打破，而向自由竞争的道路转变的。所幸的是，政府大力经营西北边疆的战略目标，使长期在边陲活动，习惯于与边军、游牧民族打交道的晋商成为首选合作伙伴。试想，如果不是依靠政府的支持，晋商能够在乡土主义、地方排外势力还比较强大的时代创造出“足迹遍天下”、纵横数千里的奇迹吗？无疑，这是有利于晋商崛起、兴盛的第三个利好消息。

然而，商品经济全球化、建立统一世界市场的要求，意味着东进的欧洲商业殖民势力不可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北部边疆这么长期对峙下去的。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拓展商品市场的压力也随之增大。经济基础的变化一定要求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革。随着欧洲商人力量的增长，他们要求摆脱传统的官商结合的体制对经济发展的羁绊，因而以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为武器，对内要求自由竞争，对外要求自由贸易。鸦片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可谓经济自由主义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以英国的胜利^[1]、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从此中华大门彻底对西方开放。随着中国国内官商结合的垄断被打破，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给晋商

XIV

以很大压力；而沿海取代山西成为联系中国和世界的桥梁，又使得晋商所经营的北部边疆市场风光不再。在市场潜力下降和竞争优势下降这双重的打击下，晋商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显然，全球化的进一步开展是促使晋商衰败的利坏消息。

由此看来，晋商的崛起、兴盛得益于三大要素：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官商结合的垄断；三是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作用。显然，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政府看到了蕴藏在商人中的力量，开始改变以往的亲自经营，转而实行招商政策，利用商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形成使明清政府将重点放在北部边疆，这使得长期活动于北部边疆，习惯于跟边军、游牧民族打交道的晋商，自然而然地被选择为执行政府战略目标的最佳合作伙伴，晋商的发迹由此而来。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经济是天然的革命派，总是以不断地破坏旧制度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商品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一方面要求以沿海来联系内地，进而联系整个世界，这使得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又要求打破官商结合的垄断，走向自由竞争。正是这两大要素的变化促使晋商走向衰败。

上述乃是晋商崛起、兴盛乃至衰败的历史大背景。

那么，在晋商最兴盛的明清两朝，中国到底强大到什么程度？其综合国力与人均GDP的状况又如何呢？这对晋商的崛起、兴盛乃至衰败构成了什么影响呢？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2]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中国GDP占到世界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公元1500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公元1820年，中国GDP占到了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3]

瓦特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整个工业生产约

增长5.8倍，工人的日生产率约提高20倍。棉织品产量从1785年的4000万码^①增至1850年的20亿码；煤产量1800年约为1000万吨，1850年达到4900万吨；生铁产量1800年为25万吨，1850年达到225万吨。”^[4]“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的40%~45%、欧洲潜力的55%~60%的现代工业能力。”^[5]

但即使如此，当时的英国与当时的清朝相比，在很长时期中，清朝还是占有较大优势的。保罗·肯尼迪认为，1750年时，英国的工业生产只占世界工业产量中的1.9%，而此时的中国生产世界产品中的32%；1800年时，英国产量占世界的4.3%，中国占33%。一直到1860年时，英国占19.9%多，中国占19.7%，英国才第一次超过中国。亨廷顿也认为，1750年时，整个西方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中只占18.2%，1800年时占23.3%，1830年时也只占31.1%，而清朝时的中国同一时期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依次为32.8%、33.3%、29.8%，1860年时还占19.7%。^[6]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时的世界GDP总量，按1990年时的国际美元来计算，中国为2286亿美元，为世界第一，英国为362.3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印度为1114.17亿美元，法国为384.34亿美元，中国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32.9%，英国是5.2%，印度是16%，法国是5.5%，中国比三国总和还多。^[7]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则强调指出，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人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8]

虽然学者们在具体的统计数字上还有微小的分歧，但都认为至少在1820年

① 1码=0.9144米。

XVI

以前，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才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竞争优势，抵御来自西方商业势力从海上、陆上的进攻，从而保持了长时间安定的社会环境。显然，这对以晋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的形成很有促进作用。

当然，长期的领先地位也让统治者滋生出骄狂自大情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自闭于世界之外，这使得中国在科学技术、军事实力等方面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内，中国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破坏，终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原因正在于此。

另外，明清时期中国的GDP尽管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但就人均GDP来看，则远不如西方国家。例如，1500年英国的人均GDP为714美元，1600年为974美元，1700年为1250美元，1820年为1707美元；同一时期法国的人均GDP依次为727美元、841美元、986美元、1230美元；中国的则为500美元、520美元、570美元、669美元。不能说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没有增长，而是说增长的速度远不如英法等西方国家快。人均GDP偏低以及长期的缓慢增长，说明国内消费能力不高，这是不利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是号称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清王朝后来被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所打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随着大清王朝彻底向西方开放，随着晋商赖以成功的官商结合的垄断被打破，晋商衰败的命运由此开始。

由此结论出发，就会发现当前关于晋商的议论很有商榷的余地。

如，在关于晋商何以辉煌500年的原因解释方面，一种议论认为，晋商所以做大，是因为有进取精神，不怕吃苦，能经受浩瀚大漠艰苦环境的考验。其实，当时的商人，无论中外没有不是过艰苦生活的。如云南马帮，他们天天爬几千米高、特别陡峭且空气稀薄的高山，不仅要跟恶劣的天气、地形做斗争，跟毒蛇猛兽做斗争，还要跟强盗、山贼做斗争。许多人由于不断地上山下山，以致到了平地都不会走路了。再如海上商人，据史料记载，15、16世纪的葡萄牙商人来远东贸易，一船人中能够活着回去的十不一二。正是因为商路艰险，从事贩运的人少，才有高额垄断利润的产生呀！因此，单从富有冒险吃苦精神，是解释不清晋商发迹的秘密的。

还有一种议论认为，晋商所以做大，是因为官商勾结。其实，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政府拥有重要山川资源的所有权，而在经营权上向民间开放时，凡是想做得大一点的商人，几乎没有不官商结合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晋商、徽商能跟官府密切结合，而其他地域的商人如江浙商人却做不到呢？

还有一种议论认为，山西人所以能够发迹，是因为地少人多的环境，使山西民人有动力外出谋生，从而形成了崇商的社会环境，为最终成为全国第一商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实，人口增长迅速，一地所产不敷一地人口所需，是当时全国性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非山西独有，说明在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下已无法解决庞大的过剩人口的问题，非得冲破土地的限制、发展商品经济不可。而封建政府的各项改革，如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也都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趋势，为无地少地的农民摆脱乡土限制创造条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人多地少的山西人发展起来了，而人多地少的矛盾比山西更突出的河南却没有发展起来呢？

我认为，只有从横向的商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角度，从纵向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明清时期会出现商品经济大发展，乃至出现十大地域性商帮的现象，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晋商、徽商一枝独秀，而沿海商人受到压制的现象。也只有放在这一大框架下，人多地少环境的作用、商人特有的吃苦精神的作用，甚至官商的结合才能得到清楚的解释。

在关于晋商的衰败方面，有一种议论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晋商的衰败。从现象上讲，这话不无道理。但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纷纷来中国这一现象呢？我认为这是商品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告诉我们：“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及殖民主义的兴起，客观上将以前处于相互隔绝的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联系了起来。无论它们是怀着光荣与梦想的天定论者，还是仍处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老大帝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这些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单个的马铃薯装进了一个口袋。”在商品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你不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也一定要被动融入国际社会，而不管愿意不愿意。

还有一种议论认为，是晚清政府的封建统治造成了晋商的衰退，主要根据是封建政府对晋商收厘金税、让晋商捐纳，而当俄国商人对晋商恶意欠款时，封建统治者竟然无所作为，使晋商遭遇了不公平竞争。从现象上来看，这话也不无